

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

刘宝春 著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

王志民 主编



中華書局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

王志民 主编

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

刘宝春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刘宝春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12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王志民主编)

ISBN 978 - 7 - 101 - 09435 - 0

I. 南… II. 刘… III. 家族 - 文化研究 - 东海县 - 南朝时代 IV. 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0743 号

书 名 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

著 者 刘宝春

丛 书 名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

主 编 王志民

责任编辑 于 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1 $\frac{3}{4}$ 插页 4 字数 457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435 - 0

定 价 157.00 元

——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 ——

主 编

王志民

副主编

丁 鼎 王钧林 石 玲

王洲明 刘爱敏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重点资助项目
中国孔子基金会资助项目



少昊陵

少昊陵是中国传说时代三皇五帝之一的少昊氏的陵墓，位于山东省曲阜市东北方向的旧县社区。现存的少昊陵是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建造的，陵宽28.5米，高8.73米，顶立12米，顶部是少昊庙。少昊陵形如金字塔，故有“中国金字塔”之称。徐姓发源于山东，尊少昊氏为其远古始祖。



徐氏始祖陵

中华徐氏始祖陵，也称豹公墩。豹公墩古墓群系汉代墓群，位于郑城街道办事处叶城后村西的一处缓坡地上，墓地东西长100米，南北宽70米，面积约7000平方米，相传为徐氏始祖墓地，是夏代徐国第五代国君徐豹公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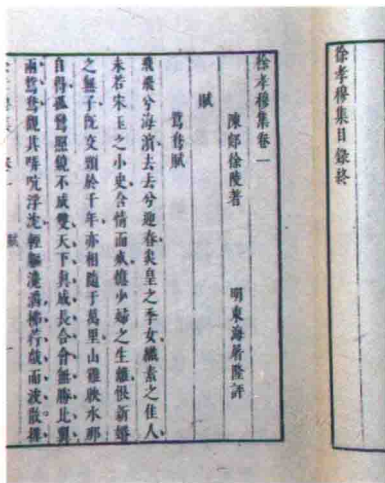
徐偃王庙

灵山徐偃王庙位于浙江省龙游县溪口镇灵山村，旧称徐偃王祠，始建未知其详，在灵山，距治南四十里。唐元和九年（814），徐氏后人衢州刺史徐放重修，后屡建屡废。1995年新庙落成，原庙内有唐韩愈题碑，现近半截存市博物馆。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由浙江省龙游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供，摄影：陈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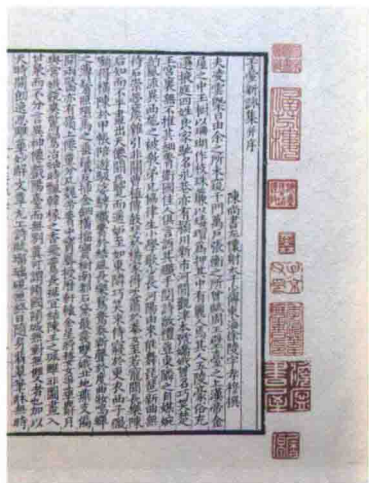
徐氏宗祠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重坊镇徐出口村。始建于明末清初，几经修缮。大门横匾题“徐氏宗祠”字样，祠堂庭院中银杏树郁郁葱葱，参天蔽日。银杏掩映中祠堂面向东方，威严座立。祠堂正门挂“东海堂”横匾，祠堂内供奉徐氏三世先祖共三十七尊牌位，牌位前设香炉、糖果等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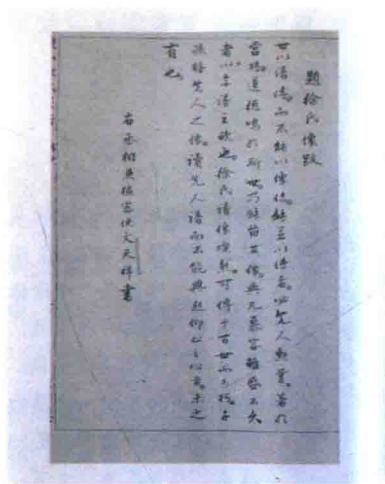
《徐孝穆集》书影

选自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屠隆合刻点评本(《四部丛刊》本)



《玉台新咏》书影

选自明小宛堂覆宋本(影印本)



《横山徐氏宗谱》

清道光十一年(1831)重修, 钞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图据复印本拍摄。谱含徐氏老谱中西山蔡元定、横甫张九成、梅溪王十朋、忠武王岳飞等叙、引、题、跋等。图为文天祥所作“题徐氏像跋”。



徐氏宗谱

徐贞贤修撰, 徐贞贤生于1918年, 已95岁高龄。据他回忆, 徐氏宗谱始修于清雍正年间, 多毁于战火, 现存六、七、八卷, 修于1962年。

(以上图片除署名的以外, 其余均由作者提供)



徐子余鼎

春秋时期侯国徐国制造的青铜器。鼎为绳索形双直耳，盆形腹上饰变形蝉纹一周，圜底，兽蹄足。青铜礼器。通高22厘米，口径24厘米，重量3200克。腹部铸铭文一行共九字：“余（‘余’通‘徐’）子余之鼎百岁用之。”此鼎是祭祀大山的礼器，于1966年出土于蒙山脚下费县南张庄乡台子沟村。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由山东省费县历史文物管理所提供。



徐偃王庙碑

韩愈《徐偃王庙碑记》碑文拓片。碑原立灵山徐偃王庙中，后因时代久远，断为两截，现仅存上半截。现存于浙江省衢州市博物馆。石残高70厘米，宽68厘米，厚8厘米，圭首。文18行，残满行14字，魏书，字径2.5厘米。1965年4月在龙游溪口溪西中央滩巨化厂桥下出土，溪口大队杨宗裕上交。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由浙江省衢州市博物馆提供。

总 序

王志民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28种)(以下简称《书系》),从2010年初正式启动,历经四个年头,终于面世。这在中国家族文化研究和齐鲁文化研究上都是一项较大的学术工程,其学术价值和影响自待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评析,我在这里仅就编纂《书系》的一点粗浅认识和工作过程,作一简述,以期得到读者更多的理解。

一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宗法制农业社会,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的家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也是立国之本。《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大约从上古以来,家族就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和支柱。

商周时期,世卿世禄的贵族世家既是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垄断者。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瓦解,出现了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制,但秦汉以后,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汉代以经学作为晋身入仕的条件,而经学传授又多限于家学私门,“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融二为一,形成了文化家族世代相因的局面,文化世家既是国家政治的中坚,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

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人用人,“中正”的评定内容,本身就有“家世”、“行状”、“人品”三项,选人要考察家族几代人的文化背景。人才

的选举与士族家族制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为文化世家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保持了文化世家在政治上的特权和地位的延续,“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①。

隋唐至清代实行科举考试选人用人制度。其破除了自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世族文化垄断,为庶族士子开启了晋身仕途之门,这是一个以科举文化传承为主导的时期。在这个漫长的科举时代,新的文化世家的出现往往要经历由文化之兴到科举之荣,再到仕宦之显的发展奋斗过程。而仕宦之家的优越条件,家学、家风的传承影响,往往使世官、世科、世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科举文化世家。这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这种家族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地域性:一个文化世家,在儒家伦理纲常主导下,以科仕为追求,历经数代发展,往往形成具有自身家族特色的家规、家训、家风。这既是一个家族内部的精神连线和传家珍宝,传递着先辈对后代的寄望和父祖对子孙的诚勉,也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先天环境和成长土壤。历史上诸多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往往出身于数代显赫的文化世家,这是重要的文化基因。与此相应的是,一个科甲连第、人才辈出的文化世家,又往往成为一个县、州或更大区域内的文化地标,其显赫门第以及通过仕宦、联姻、交游、著述、教育等形成的文化传播力深深影响着一个地域的文化发展,提升了区域整体文化形象。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②陈先生在这里说的是六朝的事,但对隋唐科举制以后的情况而言,也颇中肯綮。可见,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家族文化是一个重要载体。在中国幅员广大、地理环境复杂的文化背景下,要深入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探求家族文化,亦不可不深入探求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关系,这是我们组织撰写《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的重要学术动因之一。

① 钱穆:《国史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298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华书局,1963年,第17页。

山东文化世家和省外其他文化世家有共同性。以农立家,以学兴家,以仕发家,是历朝历代文化世家的共性。农业社会决定了任何文化世家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养成耕读家风。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往往来源于农,由农家子弟经由读书治学转变而来,这在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尤其如此。以工立家,以商立家,固然有之,然而,工商以学兴家,以仕发家,由此而成为文化世家者,却微乎其微,几乎不见。文化世家本质属性在于学,无学不成其文化世家。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一切文化世家的共同特征。唯有令其子弟刻苦读书,勤奋治学,通过经世致用而建功立业,光大门第,才能推动一个家族迅速崛起。充满书香的门第,虽然崛起于乡野小农之间,却未必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家族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这就要求其子弟必须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从政谋取高官厚禄,为整个家族的高贵和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见,农—学—仕,既是文化世家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必要阶段,也是文化世家建设与构成的三个必要因素,三者缺一不可,而学居于核心地位。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齐鲁文化有着特殊地位和贡献。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市群以及金属器等,展示出山东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在被当代学者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傅斯年先生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夷夏东西说》)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或移居中原,或西入关中,或南迁江浙,齐鲁的文化地位时沉时浮,但作为孔孟的故乡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两千年来,齐鲁文化始终以“圣地”特有的文化影响力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的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作出了其他地域文化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齐鲁文化的这种丰厚底蕴和特殊历史贡献,使山东文化世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承担、文化面貌和家族文化内涵。总览《书系》,从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关系的角度粗浅概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在这里赘述:

其一,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轨迹,反映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

历史地位的消长变迁。从历史纵向看,两千年来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呈现出马鞍型“两峰一谷”的特点:汉魏六朝为一高峰,明清为一高峰,两峰之间的隋唐宋金元时期为平谷。这一变迁,反映出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沧桑之旅。两汉时期文化以经学为主体,经学大师多为齐鲁之人,累世经学之家在齐鲁之地大量出现,这为魏晋之后,形成山东文化的高峰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书系》入选的28个文化世家中,六朝时期为7家,大多形成于魏晋之齐鲁,兴盛于随迁之江南,而且都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显赫家族,如琅邪王氏、兰陵萧氏等。唐宋时期,政治文化重心西移,域内文化世家总体零落式微,自隋至元,本《书系》入选者仅4家。明清时期是山东科举文化世家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与该时期山东文化的复兴繁荣不无关系。一是明、清两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孔孟圣裔封官加爵,登峰造极;孔孟圣迹重修扩建,前所未有的,山东的“圣地”气象空前显现。二是明清时代定都北京,山东地理位置优越。以山东为枢纽的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促进了山东经济的发达,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繁荣昌盛。三是山东作为孔孟故乡,自古有崇文重教传统。明、清两朝,特重科举,士人晋身入仕,科考几乎为唯一之途。明代即有所谓“中外文武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为官”(《明会典》)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山东域内涌现出众多科举文化世家。科甲连第、人才辈出家族各地多有;一家数代名宦,父子、兄弟文名并显者亦大有人在。一时硕学大儒,诗人名家,多出山东。到清初时,形成“本朝诗人,山左为盛”的局面。山东应为考察明清时代中国科举文化世家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地区之一。这次选入《书系》的文化世家,明清时期有16家之多,占了多半,而且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经多方研讨论证,这次仍有较多明清时代显赫的文化家族没有入选,甚感遗憾。

其二,山东文化世家在儒家文化传承及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作出过特殊贡献。第一,以孔府为代表的圣裔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中特殊的文化资源。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圣裔家族经沧桑变迁,流散各地,但他们大多发扬了圣裔家族文化传统,将血脉延续与文脉传承相结合,以尊先

敬祖与传承儒家文化为己任,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对历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其他家族无法比拟的巨大文化影响力。第二,山东文化世家的迁徙对儒家文化传播及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乃至中华文化重心的转移,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历史上山东文化世家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迁徙:一是汉代大量山东经学世家迁居关中,助推汉代儒学、经学的西渐和关中文化中心的形成。限于资料缺乏等原因,本《书系》虽然没有入选迁居关中的山东世族,但从《汉书》中记载的以田氏为代表的齐鲁大族对关中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可见一斑。二是两晋时期齐鲁世族的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元嘉之后,大批山东世家大族随西晋政权迁往江浙,本《书系》中选入的琅邪王氏、兰陵萧氏、东海徐氏、鲁郡颜氏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大多“本乎邹鲁……世以儒雅为业”,大力推展儒学,积极融入并影响当地文化,成为数代名宦的世家大族,萧氏甚至成为南朝齐梁时代的皇族,对南北文化的融合及江南地区文化的提升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北宋末年,大批孔、孟、颜、曾等圣裔家族随宋室迁都临安而南迁江浙,不仅形成儒学史上著名的孔氏“南宗”,而且在江南办教育,授儒学,为宋明理学的繁盛和文化重心的南移作出了贡献。

其三,山东文化世家主导了山东乡邦文化的特色——“礼义之邦”的形成。山东是儒学发源地,自古号称“礼义之邦”。读经崇儒,尤重礼义的区域文化特色代代传承,千年不衰。由于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和孔孟故乡“圣地”文化的不断提升和突显,以及金元以后齐鲁之地又逐步成为山东的统一行政区划,“礼义之邦”即成为山东地域共有的文化特质。而这种区域文化共性在山东文化世家中从不同角度显现出来。从本《书系》所选文化世家文化精神的主体看,这些不同时代、经历各异的家族,崇德、重教、尊老、尚义等“礼义之邦”的文化特色,既展现在圣裔之家,也反映在自汉至清历代文化世家的家风、家规、家训之中。不仅世居山东之地的文化世家,而且由山东外迁江南等地的文化世家,数代之后依然以传承故乡之风、弘扬礼义为家族文化的追求。明清时期,从山西、云南等地迁入山东之地的流民后代,最终发展为科举文化世家者,也从多个方面展现出“礼义之

邦”的文化特色。

其四,山东文化世家揭示出众多杰出人物成才与地域家族文化的关系。如果说,家庭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那么,文化世家则是时代人才的摇篮。历史上山东许多文化世家,杰出人才丛生辈出,曾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这种情况尤以六朝时期为显:泰山羊氏,羊祜、羊祉等“二十四史”有传记的即有34人,另有2人曾为皇后;王粲、王弼等彪炳史册的文学、思想大家皆出高平王氏;诸葛亮实出身于山东琅邪阳都(今沂南县)望族,成年后离乡;琅邪王氏既是西晋南迁后司马氏政权的主要政治支柱,号称“王马共天下”,也是王戎、王羲之、王肃、王褒、王融等文化名人的共有家族;兰陵萧氏自称为齐鲁“素族”出身,但南迁后,发展为人才辈出的显赫世家,齐、梁时代,荣登“两朝天子”的宝座。这在六朝时期由北南迁世族中,颇为少见。山东文化世家,大多注重家训的传承,而家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多将立德、立言、勤政、清廉等德才要求作为主旨,这对人才价值观念的养成影响甚大,山东历史上众多的文化名人中,政治上多出忠直清廉之士,文化上多出经学、文学大家,与此关系颇大。这次入选的明清时期各个文化世家,传世文献著述颇丰,都是这方面的反映。例如:明代临朐“冯氏五先生”都以文名著称;新城王氏家族共出30余名进士,不仅仕宦显赫,而且多有著述传世,王渔洋则为清初“诗坛领袖”,而且为官特重“清”、“慎”、“勤”。其他如诸城刘统勋、刘墉父子,清代彪炳文学史册的“南施北宋”之宋琬,以及田雯、赵执信、曹贞吉等,都展示出了山东文化世家特有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力。

二

在《书系》即将出版之时,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较为曲折的编纂过程。

在项目酝酿策划之初,我们就一直力图将《书系》做成一套有统一组织、有学术方向、有研究规划、有明确要求的学术创新工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制定编纂原则

其一,学术目标。试图通过《书系》的撰写,深入探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世家层面的传承轨迹,挖掘优秀的家学、家风、家训等家族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为当代新型家庭文化建设提供借鉴;通过探讨齐鲁文化在各个时代文化世家中的文化特点、面貌、发展趋势及文化贡献,深化对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的研究;通过探求齐鲁历史文化名人的成长与家族文化培育的关系,为新时期人才培养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范例。

其二,选目标准。通过反复酝酿论证,我们提出入选的文化世家应为山东历史上在政治、社会、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家族中应有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家族发展的兴盛时期,曾对时代社会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应是家族兴旺,功名显赫,人才辈出,延时较长之家族;文献丰富,资料可考,便于研究。

其三,内容设计。我们提出以下五个方面设计内容,作为拟定纲目、撰写内容的参考:一是家族发展源流。强调考察渊源脉络,探究发展演变,述其流风余韵,辨析兴衰之由。二是家族盛世研析。包括兴盛之因的探求,家族内部管理结构、婚姻关系、家庭伦理、生活方式等,亦包括对家族与时代政治、区域社会、社会交游、社会文化的关系影响等的研究。三是代表人物研究。包括成长、成才与家族文化,成就业绩与家族兴衰,著述文献与文化活动,时代贡献与社会地位等。四是家学家风研究。包括形成、特点、传承、影响及重点个案分析等。五是附录部分。包括家族大事年表、支系图表、文献书目、参考文献书目等。

其四,撰写要求。主要强调四点:一是突出学术性。强调研究深度,注重观点创新,严守学术规范,力求成为该课题学术领域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二是强调资料性。做到全面搜集,系统梳理,征引翔实,论必有据。强调注重旧家谱、旧方志、考古新发现及他人著述中新材料的发现、辨析和运用。三是显示乡土性。强调写出地方特色、家族个性、乡邦气象、社会风情。要求从齐鲁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探讨文化世家,从文化世家角度来透析齐鲁文化。四是关注可读性。强调用平实的学术语言写作,史论结合,文

笔流畅,避免文白夹杂,资料堆砌。

(二) 抓好编纂过程

《书系》完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策划启动。早在2005年,我在主持完成《齐鲁历史文化丛书》(100种)之后,旋即着手策划编纂《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30种。2006年秋天,起草了规划方案。后专门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广泛征求意见,2007年春天,规划方案在蒙山召开的齐鲁文化研究基地第六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并被列入齐鲁文化研究基地“十一五”规划标志性成果项目,但由于所需资金数额巨大,暂时搁置。2009年春天,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恢复成立。在会长、省委原副书记王修智的支持下,该项目作为促进会与齐鲁文化研究基地合作的首项学术工程正式启动,并在当年12月底前完成了所有前期准备和选聘作者的工作。2010年2月1日,召开了第一次作者签约暨《书系》编纂研讨会议,对整个编纂工作进行了部署,为圆满完成编纂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二,提纲研讨。我们将各卷纲目的设计、研讨、确立作为落实编纂主旨的关键环节抓紧抓好,将启动后的六个月作为搜寻基本资料、掌握研究动态、确定编纂提纲的阶段。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实行主编、副主编分工与作者联络、研讨、沟通制度。二是多次召开主编、副主编会议,就每位作者提交的编纂提纲(章、节、目)进行预审,逐一充分研讨、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共性问题,则提出统一修改原则,指导修改。三是根据提纲编纂情况,于2010年5月21日至23日召开了全体作者编纂提纲研讨会。采取逐个汇报、深入交流、相互审议、共同研讨方式,就提纲拟定中把握特点、突出重点、强调创新、提炼观点等问题达成共识,并在会后作者充分修改的基础上,又先后两次召开纲目审定会议,与作者反复沟通,最后逐一确立。

其三,撰稿统稿。从2010年6月至2012年8月为主要撰稿和统稿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定期召开主编会议,及时交流情况,解决有关问题。在保持与作者密切联系的情况下,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一是召开样稿研审会议。就每卷提交的一章样稿中发现的布局谋篇、行文表述、资料引用、政